



對「修院工作芻議」一文的回應

林瑞琪

一九九一年第四期的《中國天主教》刊登了一篇題為「修院工作芻議」的文章（以下簡稱「修文」），文章作者林克的名字雖然在近期的《中國天主教》一再出現，（註一）但海外人士對他所知不詳。不過，「修文」能夠佔《中國天主教》六頁紙之多，洋洋八千字，將會在中國教會內產生頗大的影響力。該文在表達對問題的看法時，一再使用「我們」來自稱，可見作者是圈內人士。因此，雖然文章未有聲明代表某一方面的意見，但亦值得關注。

「修文」除頗長的引言外，全文共分三大部份，並以精簡的回顧作為結束。文章第一部份談理想的修院教育，但重點在於評議目前修院培訓中政治思

想教育不足的問題；第二部份提出如何加強思想教育；第三點在於為解決司鐸短缺問題提供出路。

作者在引言中提出：「我們認為，在修院工作的人除了必須繼續加強神修，對修生進行熱心事主獻身教會的教育外，還必須堅持以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為辦院的主導思想，」可惜，以下全文再也沒有談及神修方面應如何加強，而是一直盤桓於「把修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到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中去設計。」從上下文中可以看到，標題所謂的「修院工作」，似乎是指向「修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引言提出了中國天主教會的四點特質。前三點是：佔人口比例小、文化素質不高、神職人員老化，

均是老生常談，第四點是：「中國教會曾長期受西方殖民主義思想的影響，先天不足，免疫能力差，加之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活動日益猖獗，『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中仍然是中國教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嚴重任務。」文章的用意，說得明白不過。

文章的第一部份，強調修院教育「任何時候也不能放鬆以『五愛』、『四有』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謂『五愛』，就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而『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註二）。原則上，這幾點除了愛社會主義是意識形態的抉擇外，其餘各點均是一般做人的理想，與思想政治教育拉不上太大的關係。

文中提到，「我們認為修院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有兩種傾向必須加以克服。」首先是以為「只要抓好修生的神修工作就可以了，別的一概不管」的「從屬論」；以及「文化水平高的人，品德修養也高」

的「代替論」。客觀來說，這兩種偏差並非中國專有的，各地的修院培育工作者也有關注到類似的問題。文中提到某些修生「有的貪戀大城市和條件好的地方，晉鐸後不願到農村、山寨或條件艱苦的地方去傳教，也有的以教會『精英』自居，狂妄自大，有餘，自知自謙不足。」類似的批評在國內其他場合也常有所聞，「修文」可說點中了問題的要害。不過，文中提出要以「政治思想工作」來平衡「神修主導」，卻未能道出具體的內容。事實上，現代修院教育提倡以神修為基礎，由內而外，及於牧民生活、社會服務各方面，並非封閉的內在修養。

第二部份談具體的修院教育。其中第二十六頁談到，「對低年級的修生可著重進行法制教育、思想品德規範教育，讓他們懂得做一個合格公民的起碼準則。」強調愛國守法，是無毫疑問的。不過，作者也許忘記了一點，天主教人士往往被表揚為愛國守法的模範。《中國天主教》亦一再刊登這方面的報導。（註三）考進修院者更理應是良好公民的

典範。在他們進了修院之後，爲何反要再花時間「讓他們懂得做一個合格公民的最起碼準則」？

然而，文中指出，「對高年級修生要著重進行職業道德教育，積極創造，深入基層，接觸群眾，了解社會，參與實踐的機會，使他們從中學會正確地認識國情，認識社會、認識生活、認識自己。」不但點中了中國教會的需要，亦是亞洲各地修院培育者所熱切探討的問題，可謂殊途同歸。（註四）

「修文」第二部份的五個要點中也有令人費解之處。其中談到具體的教育，第一點說「我們對廣大修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就不能停留在愛故土、愛家鄉的樸素的愛國主義上，更不能降低到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水平上，而應當讓樸素的愛國情感上升到社會主義的新境界，也就是說要通過對他們進行民族氣節教育、國情教育，幫助他們了解祖國的悠久歷史，特別是近百年來不屈不撓、抵禦外侮的歷史。」國情歷史本是客觀真理，爲國內外人士都適用，爲何在了解上有升降或高低水平之分？

第二點強調修院教育要與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和傳教史的教育相結合；第三點指出：「要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結合起來。前些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所造成的思想混亂、理論混亂還遠未肅清，而某些人散佈的社會主義『失敗論』、『早產論』，以及種種挑撥黨和知識份子關係的消極影響仍陰魂不散。」撇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不談，站在實際立場出發，向青年學生宣揚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豈不容易成爲替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作免費宣傳？（註五）

第四點，「要加強艱苦奮鬥的教育」，這在中國大陸的修院上早已實行。八十年代中期，筆者曾探訪中國大陸多所各類型修院，其中除了佘山修院及北京中國神哲學院的生活稱得上較具規模之外，其餘的修院都很有「苦行僧」的味道。文章呼籲「修院應有意識地引導他們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雷鋒精神、鐵人精神和焦裕祿精神。」然而，獻身精神的表樣在目前中國天主教會內比比皆是，以他們

作榜樣似乎更能表達出基督化的犧牲精神。(註六)

「修文」第三部份談修院教育如何改革。文中以「每年按百分之十的比例自然減員，到一九九七年老一輩神職人員能堅持工作的將不足三百人。而這期間，如按六年制計算，全國幾所大修院也只能培養出新神父四百人左右，遠不能滿足實際工作的需要。」所列舉的數字似嫌偏向悲觀。過往數年間各修院經已培養出超過三百多位新司鐸，單就一九九一年已有超過一百人晉鐸，而目前在修院攻讀的修生亦超過七百，(註七)其中不少將於兩三年內畢業。按照目前修院招生時的踴躍情況，司鐸聖召的蓬勃，在數年內肯定可以維持。無疑，即使按照目前的「景氣」發展，論實際人數仍遠遠追不上教友的需求。無論何時，設法擴充司鐸培育的服務仍屬當務之急，但假如爲了追求數字上的成就，因簡就陋，結果可能會拔苗助長，因加得減，浪費了求學者的時間及教會的心血。至於提出設立半年制、三個月的乃至幾星期的短訓班。這爲教友培育也是

有益和需要的，但卻不是取代正規的修生教育之道。

其餘各點，包括強調適當分工、創新課程、培養修生自學能力，加強師資隊伍和教材建設，都是很有意義的建議，其中數點實際上經已施行。不過當中談及「全國神哲學院培養的重點應放在修院師資、研究人員、外事工作人才和教會領袖四個方面，亦即高級神職人員」，顯然中國教會對外事工作十分重視，以之與教會領袖並列。這種取向有助促進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溝通，實是可喜現象。不過，話得說回來，神職人員之中是否應有高級與低級之分，頗成疑問。尤其在現今強調參與、服務及共融的時代，「高級神職人員」一詞實堪商榷。

「修文」總結時，一方面肯定過往的成績，另一方面卻又提出他們所認爲存在的問題，「最大的不足是還沒有能夠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這根紅線貫串到修院教育工作中的每一個環節。．．有的放矢地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國共產黨執政達四十二年之久，仍說中國教會所辦的修院未能貫徹獨立自

主自辦教會的路線，似乎有欠自信。文章結論談到，「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西方敵對勢力正乘機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對我進行滲透。」亦明顯反映出對最近十多年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成就缺乏信心。

「修文」以探討修院工作為題，似乎用了過多的篇幅大談政治思想教育，假如我們從文章中抽出有關政治教育的部份，全文僅餘三分之一，令人覺得有失平衡。談及天主教司鐸培育中的獨身問題，該文也僅僅一筆帶過，並未深入探討獨身生活在現代世界的積極意義，誠屬可惜。

最後，「修文」作者大談加強思想教育之餘，但卻與當前國內許多其他範疇的思想工作者一樣，提不出具體的思想教育內容。不過，這並非修院教育工作者獨有的困難，而是整個中國所面對的難題。無疑，全國當前確實需要一同反省其政治思想取向。

附註：

註一：在九零年第二、第三、第四期及九一年第二期《中國天主教》當中，均有刊載林克的通訊或簡訊，但篇幅甚短。

註二：參考李振杰、白玉崑等人合編《中國報刊新詞語》，八七年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出版。

註三：遠的不談，同一期的《中國天主教》就刊登了多篇表揚教友愛國愛教的文章。

註四：參閱本期《簡訊》有關亞洲司鐸培育工作研討會的報導。

註五：一九八六年安徽省合肥市學潮之後就曾出現類似現象，中央傳達批評方勵之的文章，結果成了替方氏作個人宣傳。

註六：《中國天主教》九一年第五期刊登「向歷代聖人聖女們學習」，可補充這方面的不足。

註七：參閱《中國天主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宗懷德天主教的講話」。